把“落后”作为解读革命小说的一个方法

——谈《小二黑结婚》到《荷花淀》《党费》的组合性理解

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 詹 丹

图片

一、问题的提出

统编高中语文教材选择性必修中册第二单元把《荷花淀》《小二黑结婚》（节选）和《党费》作为红色经典小说组成一课。课后的“学习提示”和“单元研习任务”，也是把这三篇小说整合在一起来分析和讨论的。这提示教师开展课堂教学要有把三篇小说整合起来的自觉意识。尽管围绕着语文教材的单元组合和一课中的群文阅读教学，语文界曾引起激烈的争论，一些竭力主张单篇教学的教师认为，强调教学中的多篇文章整合，对个性化的文学作品来说，容易导致牺牲单篇作品具体的特殊性，形成对文学作品教条化、公式化的理解。对于这样的看法，我不敢苟同。这不仅仅因为脱离了具体课例的抽象讨论并无多大意义，而且，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以来，语文教材阅读文章的编排，主要就是以单元来呈现的，语文教师在实践中也曾经有过不少的尝试。记得笔者1980年代中期刚进入中学任教，在钱梦龙校长督促下写的第一篇稚嫩的科研论文，就是探索阅读教学的单元组合问题。2002年，和同事薛毅老师一起编选《现代语文读本》四卷，一方面在序言中讨论了文章阅读的单元文本组合问题，另一方面，由我们两人分头撰写置于每个单元前的“阅读提示”，基本也是从文章组合式角度来分析的。此外，沪上名师沈蘅仲的备课札记《知困录》，也不时建议教师把许多古诗文阅读的相关资料补充进课堂，形成群文阅读方式，比如把不同作者的四篇《六国论》、不同时代的作者写下的石钟山游记结合在一起备课，或者把民歌《折杨柳枝》和《木兰辞》互为印证，都是组合式的阅读教学策略。流传较广的沈祖棻《唐人七绝诗浅释》把多篇绝句组合起来阅读鉴赏，也对语文教师的教学产生过深刻影响。类似的文本解读或者语文教学实践，跟当前新教材推行的单元教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有些教师包括一些知名学者把单元文本组合式的阅读教学一概等同于篇与篇之间的共性概括，其实还是把单元教学理解得机械化、简单化了，或者他们所接触到的一些并不成功的教学实例是机械的、教条的，误导了他们，从而让他们得出了未必恰当的判断。其实有时候，教师恰恰是通过群文组合，借助引入一个特定的理解范畴，让篇与篇之间具体的特殊性得以彰显，提高了不同作品个性差异的辨识度。

当然，时下的新教材在传统阅读文章的单元内部组合基础上，又增加了一课多文的形式，但依然保留了一课一文的形式，比如我们将要讨论的选择性必修中册第二单元，既有前述的一课三篇小说，也有如《包身工》这样的一文一课，这样，是立足于一课一文，还是一课多文，或者单元整体开展阅读教学，可以让教师根据文本特点和具体学情，作自主选择。

就选择性必修中册第二单元来说，之前我曾对其中的《荷花淀》一篇小说，从版本角度作过比较分析。而我的同事冷嘉老师则对其中的《小二黑结婚》作过单篇的文本分析，受冷嘉老师分析结论的启发，我这里尝试提出三篇小说组合阅读的一个角度，就是所谓的“落后分子”或者说“落后”性。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角度，首先依据的是该单元“研习任务”的要求，该要求是从小说塑造的“典型形象”角度，让学生选择“最喜欢的一个人物形象，分析其性格特征，并结合作品的时代背景和小说中的社会环境，说说人物的典型性体现在哪里”。但如果从客观而不是主观的喜爱度来梳理三篇小说的典型形象的谱系，那么《小二黑结婚》这篇作品起码为我们展现了三类人物，其一是作为故事正面形象的关键人物小二黑和小芹，其二是作为反面形象的黑恶势力兴旺和金旺，但真正塑造得个性鲜明的却是落后人物二诸葛和三仙姑。这二位形象既比反面形象饱满，也远比正面形象小二黑和小芹生动，冷嘉老师就有相关论述来比较两类不同人物的塑造效果：

小二黑和小芹虽是故事中的关键人物，但这两个人物形象缺乏个性，甚至谈不上有多生动——远不如二诸葛和三仙姑予人印象深刻。他们争取婚姻自主的行动虽是推动情节发展的核心事件，但这一事件本身并未展现出诸如主体精神成长等层面的现代意义，而更像是一个汇聚并呈现村庄中各种旧势力的枢纽。

《小二黑结婚》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反对封建思想，封建习惯”，二诸葛和三仙姑是具有封建意识的落后农民的突出代表，作者对这两个人物做了夸张和滑稽化的处理。但在小说中，这两个人物既是被批判、被改造的对象，又是作者顾念的乡邻乡亲。由此可见，赵树理思考中国革命意义的起点，正是在这群“旧人物”“落后人物”的身上。在他所构想的新世界图景中，不仅活跃着进步的新人“小二黑”“小芹”等，而且通过“前进的带着落后的”，落后人物在心理和情感上得到疏导和调适，最终被吸收到新的伦理氛围中。［1］

正是把分析的视野聚焦于小说中的“落后分子”，打开了我们对其他两篇小说的分析思路，换言之，小说凸显的对“落后分子”的描写，也成了理解其他红色经典的一种方法和推进思考的概念。当然，以此为方法和思考的概念，不是要用《小二黑结婚》里出现的栩栩如生的落后分子来代替、遮蔽其他小说里近似的人物形象，得出一个普遍存在的同质化的人物典型和同质化的小说立意的分析结论，而是在这样的落后分子的比照中，发现不同小说在人物形象的似乎相近元素中，其中深刻而又参差变化的那种不一致，借助形象驱动中的相关概念内涵的内在裂变，或者一种要素的空缺，来发现作家构思的一条路径。

下面先讨论《荷花淀》。

图片

二、“落后”概念背后的情感和生活

先要明确的是，《荷花淀》中并无二诸葛、三仙姑那样典型意义的“落后分子”，但反过来说，引入“落后分子”这个概念，也不是为了说明这类形象或者这类形象的一些要素在该革命小说中的完全缺席。提出“落后分子”以及近似“落后”的概念来理解《荷花淀》人物形象，是因为小说描写到的女人们的言行，包括男人对她们的评价，确实涉及了这些词语。

比如，小伙们在区里报名参加游击队后，不敢回家跟自己妻子说，只让水生一个人回来，就有水生对自己妻子说的一番话：

“他们几个也报了名。他们不敢回来，怕家里的人拖尾巴，公推我代表，回来和家里人说一说。他们全觉得你还开明一些。”

其中，“拖尾巴”意味的“落后”以及不够“开明”，是村里男人们对大多数女人们的看法。顺便一说，孙犁原作两次提到“家里人”，第二次后面有个“们”，［2］课文删除后一个“们”未必合理。笔者另有文章讨论，此不赘述。［3］关键是，围绕着文本内部的所谓“拖尾巴”以及后文的“落后分子”等说法，导致了读者的一种误解。

因为后来小说写几个女人思念参加游击队的丈夫，冒冒失失结伴去探亲，结果遭遇鬼子而划船逃跑，正好把鬼子带到了游击队在芦苇丛里布置下的包围圈，让游击队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在打扫战利品时，游击队长、水生和他的妻子间，有了一段微妙的对话：

（队长问女人们：）“你们干什么去来呀？”

水生的女人说：“又给他们送了一些衣裳来。”

小队长回头对水生说：“都是你村的？”

“不是她们是谁，一群落后分子！”说完，把纸盒顺手丢在女人们船上，一泅，又沉到水底下去了，到很远的地方才钻出来。［4］

在这里，游击队长既在对水生的女人说，又回头对水生说，虽然都得到了直接的回复，但这回复，又似乎是说给在场的其他人听的。送衣服是给“他们”送，因为女人不是直接对着自己的丈夫说的，那种关爱之情，便有了几分内敛。水生指责女人是“落后分子”也是对着队长说的，同样免去了直面对女人指责的几分尴尬。但也可以理解为，有了先予声明的“落后”，一种把自己置身事外的态度，可以化解面对队长的尴尬。特别是指责的同时，又把饼干纸盒丢在女人们船上，似乎有点安抚的意思。而潜水很远才冒出来，既像潜水本领的卖弄，又像要跟近前来看他的女人故意躲开去捉一下迷藏。这样一来，语言的直白、生硬与行动的柔情且富有弹性，给“落后分子”的概念添加了许多异质化的情感内涵，甚至可以认为，正因为有这样的表面指责，掩护了夫妻间微妙的感情传递。

可惜的是，一些头脑教条的读者在阅读理解中，却抽空了概念本身的弹性，简单填充了在思想政治方面的内涵，从而得出了孙犁歧视女性的看法。

1950年代，有一批爱好文艺的在校生，就曾写信给孙犁表达了她们的不满。其中举到水生和游击队长的对话作为例证。对此孙犁认真给予了回复：

因为队长问：“都是你村的？”水生说了一句：“不是她们是谁，一群落后分子！”你们又说这是对女人的“嘲笑咒骂”，是给“远来送衣的爱人以凶相”。

水生这句话可以说是嘲笑，然而在当时并不包含恶意，水生说话的时候，也没有表现“凶相”。他这句话里有对女人的亲爱。这并不等于给她们做鉴定，肯定她们是“落后分子”。在日常生活里面，夫妻之间是常常开这样的玩笑的。

我们看作品，不能仅仅从字面上看，还要体味一下当时的情调，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只和概念理论对证，还要和生活对证，就是查一查“生活”这本大辞书，看究竟是不是真实，如果不是这样，许多事情都是无法理解的。［5］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在校生对小说中人物的言行都作了简单的、字面上的直接理解，或者说，这也是从概念出发的机械、教条的理解，而孙犁提出的“生活”、提出的“当时的情调”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时下反复强调的，阅读理解要从具体情境出发。正是对特定情境的体味，使得“落后分子”这样一个似乎侧重于指向政治思想的概念，有了情感的内涵，它更多地包含着俗语所谓的“打情骂俏”的意味（当然不是在贬义上来使用）。水生和其女人借助游击队长完成的那种间接对话，把附于其中的复杂情感，从向队长传递的信息中剥离出来，隔空传递到了另一边人的心里。生活的广阔性和人际关系的复杂性，使得《小二黑结婚》中“落后分子”中那种鉴定人物的政治思想色彩（尽管在二诸葛和三仙姑身上也掺杂着特殊的心理文化问题，详见冷嘉的分析），在《荷花淀》中是比较单薄的。如同水生女人低着头说水生“你总是很积极的”这句话时，思想情感相当复杂，至少，埋怨和赞扬、光荣和不舍是兼而有之的。但孙犁写出这种复杂性，写出女人们对走向前线的丈夫有摆脱不了的情感依恋，那种似乎是革命精神不彻底的“落后”元素，倒并不被认为是一种需要清除的杂质，而恰恰是带给了男人们情感与暖意，说明了女性的可爱与伟大。而那些在校生写信指责孙犁歧视女性，恰恰是把话说反了。

如同孙犁在描写女人们对丈夫的依恋表现出“拖后腿”“落后”的一面与支持丈夫们上前线的进步的另一面完全相容的一样，女人们投身战场的崇高性，也是与她们爱面子、争口气的小心思相容的，而后者，似乎又成为在校生指责孙犁把女人塑造得落后的又一证据。他们举出女人们说笑着要学会打仗把丢了的面子挣回来的话，说：“作者将这些妇女们武装自己的动机，没有放到这一正义的伟大的基础上，却将它写成是为了个人争口气，为了使自己的丈夫看得起自己。” ［6］

对此，孙犁的答复是：

我以为在一个具体的场合下，妇女说这样几句话，并不掩盖更不抹杀她们素日的抗日要求。这个要求，就是你们说的“正义的伟大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有临时的激刺，和临时的影响的作用。［7］

这样，在提出追求正义的前提下，又把特定情境中的临时的刺激因素加进去加以描写，同样体现人的复杂性和生活的丰富性。如果这种个人爱面子的刺激是一种对“落后分子”才有的刻画的话，反映在《荷花淀》中，又是体现出孙犁对人物和生活理解的广度和深度。也是由于类似的原因，晚近时期，不少人强调水生女人对丈夫说的“你走，我不拦你，家里怎么办？”中“不拦你”后只有句号才是正确的，才能体现出女子的深明大义，才是真正理解了孙犁的创作意图，其实都是对小说出现“落后”因素及其相关称呼所作的简单粗暴而又机械的理解。这个问题笔者另有文章讨论，此不赘述。

图片

三、“落后”的另一种形式：孩子及孩子气

那么，《党费》呢？

也许，相比《荷花淀》出现的“拖尾巴”“落后分子”等言说，小说《党费》似乎并没有给“落后分子”留下多少栖身的场所，其中，革命者与国民党兵的严峻对立、残酷斗争以及鲜明站队的不同立场，也使处于中间立场的所谓“落后分子”的空间被大大挤压了。不过，并没有与作为革命者的主人公形象黄新在思想行为上保持高度一致的人物还是出现了，这就是黄新的女儿妞儿。

尽管就这一课中的三篇红色经典来说，《党费》在思想的丰富性和艺术的独创性来说相对单薄，人物形象的层次感也比较单一，但恰恰是借助塑造黄新身边的妞儿形象，小说增添了一定的厚实感。而才五岁的妞儿生理上的不成熟与心理上的不坚定，又跟黄新拉开了一段政治思想的距离，也或多或少有了一点“落后分子”的影子。

关于妞儿的形象，在小说中是随着担任游击队的交通员“我”跟白区的党员黄新取得联系后，慢慢进入“我”的视野的。最生动的一些细节描写，几乎都是围绕着妞儿而展开的。包括“我”第一次下山和白区的党员黄新接头，对妞儿不经意的一笔描写：“地铺上一堆烂棉套子底下躺着一个小孩子，小鼻子一扇一扇的睡得正香。这大概就是她的小妞儿。”［8］但重点渲染的，是“我”去黄新家取山上急需的腌菜，这些腌菜因为是革命群众从自己嘴里省下而凑起来的，妞儿平日也吃不到，于是就出现了全篇可能最生动形象的一段描写：

妞儿不如大人禁折磨，比她妈瘦得还厉害，细长的脖子挑着瘦脑袋，有气无力地倚在她妈的身上。大概也是轻易不大见油盐，两个大眼骨碌碌地瞪着那一堆堆的咸菜，馋得不住地咂嘴巴。她不肯听妈妈的哄劝，还是一个劲儿地扭着她妈的衣服要吃。又爬到那个空空的破坛子口上，把干瘦的小手伸进坛子里去，用指头蘸点儿盐水，填到口里吮着，最后忍不住竟伸手抓了一根腌豆角，就往嘴里填。她妈一扭头看见了，瞅了瞅孩子，又瞅了瞅箩筐里的菜，忙伸手把那根菜拿过来。孩子哇的一声哭了。［9］

这里，妞儿忍不住偷吃，其实也是人的正常需要，搁在儿童身上更无可指责，似乎谈不上“落后”问题，只是黄新的近乎狠心的坚定政治觉悟，才把作为没有长大的孩子衬托得有些“落后”了。但是接下来，“我”的一番举动，又把革命者和人情味的那种可能断裂，较好地衔接了起来：

我看看孩子，孩子不哭了，可是还围着个空坛子转。我随手抓起一把豆角递到孩子手里，说：“千难万难也不差这一点点，我宁愿十天不吃啥也不能让孩子受苦！……”［10］

耐人寻味的是，“我”的人情味体现，对妞儿的照顾，是以牺牲“我”的食物为前提的，在这种牺牲中，“我”的革命性与人情味似乎得到了协调。但接下来的情节发展，似乎又表明了，在真正的革命原则下，那种认为借牺牲自己以拯救他人所体现的人情味，在特定场合也会显示出幼稚、不成熟的一面，因为在革命的根本原则前，牺牲或者不牺牲自己，都是服从组织需要的。于是，生理不成熟的妞儿在小说中再次发挥了所谓“落后”的功能性作用。

当黄新为了掩护躲在阁楼上的“我”而被国民党兵抓走，“我”一时冲动，不顾承担的责任，准备与国民党兵拼个鱼死网破，小说这样写：

我刚打算往下跳，只见她扭回头来，两眼直盯着被惊呆了的孩子，拉长了声音说：“孩子，好好地听妈妈的话啊！”

这里，黄新口中的“孩子”一语双关，表面上指在场的妞儿，还没长大的她，实质上是指“我”，指“我”没有完全摆脱“落后”的那种不成熟、不坚定。而小说也借助“我”的心理描写，把黄新口中的“妈妈”作了新的阐释：

我用力抑制住了冲动。但是这句话也只有我明白，“听妈妈的话”，妈妈，就是党啊！［11］

从最直接的字面来理解，黄新此刻似乎成了党的代言人，听黄新的话而不冲动行事，就是在听党的话。但进一步说，黄新挺身而出救交通员的“我”，也是在听党的话。这样，在听党的话这一点上，即使是对党内同志而言，也有相对落后和更为进步的区别，区别出的相对“落后”一面，那种理性的不坚定，在不同场合，体现出或者是人情味或者是幼稚盲动的不同特征。凡此描写，都丰富了小说所塑造的人物和人物形象的层次感。

图片

四、余论

对于革命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来说，如果用一种稍显机械的方式加以阵营划分，那么，“落后分子”往往是敌我对立两大阵营的中间分子。而当我们把“落后分子”的称谓或者某些“落后”元素挪用在革命队伍内部的人物身上，往往是让思想给感性腾出了更大的空间，让原则给具体实践以复杂的面向。从一方面说，实际的生活情境中，有人会挪用类似“落后”的概念而注入其新的意义；另一方面，有些作家也会有意识地利用这样的概念，构拟出反讽式的含义空间。而从根本意义上说，相对于革命原则的彻底和绝对，行动中的革命人，总存在着相对的不同层级的落后性，因为这是革命前进中的落后性，所以才会被融入革命的大家庭中，并进一步发展出人类命运的共同体。尝试揭示这样的意义，既是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而言的，也是对小说整体世界而言的。这里提出初浅的一些讨论，欢迎方家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冷嘉.文学如何书写革命──赵树理《小二黑结婚》解读［J］.语文学习，2021（10）：56-57.

［2］孙犁.孙犁文集（补订版）：卷1 ［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93.

［3］詹丹. 语言的品味——谈编者对孙犁《荷花淀》的几处改动［J］.语文学习，2021（07）：59.

［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教科书语文：选择性必修中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65.

［5］孙犁.孙犁文集（补订版）：卷6 ［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337-338.

［6］同［5］342.

［7］同［5］338.

［8］同［4］74.

［9］同［4］76.

［10］同［9］.

［11］同［4］78.

——《语文学习》2023年第4期